

辛亥文化革新与“五四”新文化运动

龚书铎

对于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思想文化方面的贡献及其历史地位,长期来评价不高,甚而被贬低。如有的研究者认为,近代80年的文化历程,经历了洋务运动的“中体西用”、维新思潮和新文化运动三个阶段,把辛亥革命时期的思想文化包括在维新思潮阶段,没有它的独立地位。有的研究者认为资产阶级革命派忽视了思想文化,其贡献远不如维新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有的研究者则认为,辛亥革命只是制度层次的变革,“五四”新文化运动才进而思想文化层次的变革。有的研究者甚至断言,辛亥革命只是打落中国最后一顶皇冠,别的毫无意义。这些论断或多或少存在着片面性,并不符合客观实际,不是实事求是的。对此,笔者曾撰文阐述自己的一点看法(《辛亥革命与文化》,《历史研究》1989年第5期)。在这篇文章的结语中提到:在“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新文化曾经发挥了同封建阶级旧文化作斗争的革命作用,并为‘五四’前的新文化运动创造了条件,开辟了道路”。“‘五四’前的新文化运动,应该说是辛亥革命时期‘文化革命’的继承和发展”。这里说得简略概括,有必要加以具体阐述。

首先,研究思想文化不应局限于思想文化本身,不能只看当时在这方面做了多少事情来论定其贡献的大小,而应联系诸如政治等其他因素来考察。尤其是大的政治运动,它在思想文化上所产生的作用是不能低估的。辛亥革命这场伟大的政治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2000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虽仅存在三个月,《临时约法》也终于被撕毁,但是这毕竟是“三千年一大变局”,震撼了中华大地。如此巨大的政治变局,不可能不对思想文化的变化发生影响。这种作用和影响,不是报刊一般宣传所能代替的。事实上辛亥革命无疑是对封建主义旧制度、旧观念、旧思想、旧习俗一次猛烈的冲击,使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民主思想、共和国观念深入人心。辛亥革命后,尽管有袁世凯和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有尊孔复古逆流,但民主、自由的风气和潮流却也在向前发展。

辛亥革命后,文化事业有了发展。首先是教育事业的发展。以1912年为例,该年大中小学学生总数超过1911年的一倍,其中女学生增加得更多。这些新型的知识青年中的一部分人,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传播新思想、推动时代观念发展的重要力量。其次是新闻出版事业出现新局面。仅就报纸而言,武昌起义后,“一时报纸风起云涌,蔚为大观”。半年内,全国报纸由10年前的100多种,增加至近500种,总销数达4200万份(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181页)。这是前所未有的。许多报纸议论时政,宣传民主、科学和各种社会政治思潮。第三是政党、社团如“雨后春笋,蓬勃兴起”。1912年10月,仅在民政部立案的团体就有85个。据有的记载,政党、社团数目曾高达300多个。在社团中,为数不少是文化、学术团体。这些社团集合了当时一批有志于研究学术和社会问题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创办刊

物，举行讨论会、演讲会，邀请学者讲学，大大活跃了当时的思想界。上述辛亥革命后出现的新的变化，显然是由于辛亥革命及其建立的民国的结果。

就思想文化本身而言，如果我们不割断历史，实事求是加以考察，就不难发现“五四”前新文化运动所提出的主要问题，几乎在辛亥革命时期都提出来了。“五四”前新文化运动的发生无疑是时代的需要，具有时代的特点。但是，作为文化运动本身，它又是有着发展衍变的过程，不是突如其来的。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在‘五四’以前，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中国的文化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他还指出：“在‘五四’以前，中国文化战线上的斗争，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和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在‘五四’以前，学校与科举之争，新学与旧学之争，西学与中学之争，都带着这种性质。”显然，在“五四”以前的新文化运动，就是资产阶级的文化运动。大体上说，近代中国的资产阶级文化运动是从维新运动时期开始的。由于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更直接的是由于救亡图存、变法维新的政治运动的蓬勃发展，从而出现了这场资产阶级文化运动。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继承了戊戌新文化思潮，有所批判，有所继承，推进了资产阶级新文化向前发展。辛亥革命后，进一步发展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成为近代资产阶级新文化运动的最高潮。“五四”新文化运动也就是在辛亥革命时期新文化的成就和不足的基础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

“五四”前的新文化运动，以“民主”和“科学”为两大旗帜，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并把斗争锋芒指向维护封建制度的“孔教”。然而“五四”前新文化运动所提出的主要问题，几乎在辛亥革命时期都已经提出来了。人们称赞“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认为这个时代掀起了前所未有的引进国外思想的局面，西方政治、文化思想广泛传播，诸如马克思主义、民主主义、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改良主义、新村主义、泛劳动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等等，主义纷繁，学说杂陈。但是，这些主义、学说并不都是在五四运动前后才在中国传播，其中不少在辛亥革命时期即已输入了。在本世纪的最初10年间，欧美主要哲学流派和代表人物，从古代至近世，都介绍到中国来，如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儿、培根、斯宾诺莎、霍布斯、达尔文、卢梭、孟德斯鸠、边沁、康德、黑格尔、叔本华、尼采以及詹姆士的实验主义。政治思潮如民主主义，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发展而盛行。对于民主主义，当时革命党人认为最要紧的是民权，“世界万国，以有民权而兴，无民权而亡者，踵相接，背相望”。中国“之所以能脱之倾之去之除之复之者，在种吾民革命之种子，养吾民独立之精神，而可一言以蔽之曰：民权而已”（《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第70、66页）。在民权问题上，对女奴的呼吁和争取是很突出的。他们提倡男女平权，认为“女权愈振之国，其国愈文明；女权愈衰之国，其国愈衰弱”（同上书，第1卷下册，第924页），倡言“二十世纪为女权革命世界”。“五四”前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等人鼓吹人权，提出人格独立、个性解放等民主主义的思想主张，显然是对辛亥革命时期民权思想的继续和发展。“五四”前后在各种思潮中曾占有优势的无政府主义思潮，也是在辛亥革命时期被介绍到中国。其时，《新民丛报》、《东方杂志》、《浙江潮》、《江苏》、《民报》等报刊都刊载过介绍欧洲无政府主义的报导、评论。1907年，革命派中无政府主义信仰者分别在日本东京和法国巴黎创办《天义报》和《新世纪》，宣传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自有其基本的思想，但也存在着不同流派，提出了不同的主张。刘师培就认为无政府主义有三派，施

蒂纳的个人无政府主义、托尔斯泰的消极无政府主义和克鲁泡特金的共产无政府主义。三派中施蒂纳的太高远，只有克鲁泡特金的“自由结合”说最为的当。而刘师培就是吸收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结合自己的思想，形成了具有特色的平等无政府主义体系。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五四”运动前后在中国知识界颇有影响。

对中国产生伟大影响并成为实践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潮，在本世纪开初就介绍到中国来了。革命派的报刊如《浙江潮》、《江苏》、《民报》等，发表了一些介绍社会主义学说的文章。其中以《民报》的贡献为大，朱执信的表现为突出。朱执信在文章中肯定社会主义社会是“最进步之社会”，并介绍了马克思《共产党宣言》的阶级斗争学说。尽管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还较肤浅，乃至有所误解，但在当时来说却是很难得，很有远见的。由于国内和国际的状况，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家有其特点，他们所要进行的是推翻封建专制制度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却又看到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富者益富，贫者益贫”，存在着“不均”和“不公”，因此认为应当用社会主义来救治资本主义的弊病，“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他们对社会主义的介绍和同情，也就不足为奇了。资产阶级革命派对社会主义学说的介绍，当时虽没有产生什么社会影响，但其前驱的作用是不应抹杀的。

辛亥革命党人和“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者，宣传民主主义思想，都是反对封建三纲五常，批评儒学，直至把矛头指向孔子。这里既表现为政治、伦理的民主，也表现为学术的民主。辛亥革命党人反对儒学独尊，提倡诸子学。诸子学的兴起，在于乾嘉学派，汪中、王念孙、俞樾、孙诒让等人都做了贡献。但是，诚如刘师培所说，他们的研究“大抵甄明诂故，掇拾丛残，乃诸子之考证学，而非诸子之义理学也”（《周末学术史序·总序》，《刘申叔先生遗书》第14册）。章太炎、刘师培、邓实等人的提倡和研究诸子学，则是“诸子之义理学”。他们用新理论研究诸子学，章太炎撰《诸子学略说》，刘师培发表了《周末学术史序》，《国学振兴社讲义》第一分册也刊载《诸子系统说》等。刘师培等人把复兴古学看成是类于欧洲的文艺复兴，而复兴古学的内容即在于复兴诸子学。不论他们鼓吹复兴古学有什么弊病，且亦不能与欧洲文艺复兴相提并论，但他们把长期被排压的诸子学提到与孔学同等的重要地位，揭发出诸子学中有价值的内容，则是有意义的。

与提高诸子学地位相联系的，显然是降低了儒学的地位。就是说，儒学从独尊的统治的地位降为普通的学术流派。在章太炎等人看来，儒家不过是诸子中的一家，而其经典也不过是孔门的教科书或历史文献。他们还进而对儒家和儒家思想进行了批评。章太炎说：“儒家之病，在以富贵利禄为心”；“儒术之害，则在淆乱人之思想”（《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289、291页）。刘师培认为汉儒的家法、东汉的讎纬、韩愈的道统、宋明的理学都是“伪学”，是君主进行思想统治的工具。有的人以“贵我”即人的独立精神来批评儒家学说，指斥“儒者立说”是“剥丧人权，阻碍进步，实为人道之蝥贼”（《泛教育论》，《游学译编》第9期）。“中国之所倡儒者，并非孔孟，乃人君假之以为奴隶之介绍者，故唯不儒然后可以办事，儒则熏心于奴隶也。于是遍览累朝之儒臣奴媚外种者十之八九，是除孔孟之外，凡所谓儒者，皆奴隶之学也”（《劝同乡父老遣子弟航洋游学书》，《游学译编》第6期）。在《警钟日报》、《国民日报》、《中国白话报》、《河南》、《民吁报》、《民立报》以及《天义报》、《新世纪》等不少报刊上，都刊载有批评儒学的文章。在批评儒学思想中，比较集中批判封建伦理纲常，如有的文章指出：“三纲之制，取政治、法律、风俗、伦理概而

包之，以陶鎔中国于专制之下，成为中国人第三天性不能自拔。积而久之，制造出一种有君无臣、有长无幼、有男无女，至不平等，至不自由，永无释放，永无进步之教化。”（《迷信儒教之心理》，《民立报》1913年9月3日）

革命党人从批评儒学，进而重新评价孔子。在他们的评论中，首先是将作为“圣人”的孔子变为“凡人”的孔子。康有为在戊戌维新时虽然批判儒学的某些方面，但却标榜“孔子改制”的旗号，尊孔子为教主，主张立孔教为国教。而章太炎、刘师培等人则认为孔子不过是当时诸家中的一家，如刘师培说：孔子“也是个儒家的一派，一定说他是‘至圣先师’，却也未免太过的”（《孔子传》，《中国白话报》第13—14期）。或认为“吾国学有渊源，非止孔孟一支，平其心，静其气，无所重轻，兼采众说，以求公理，则虽余固未能谓孔孟无可取也。唯强余以为至圣，沮人生之自由，禁学术之发达，再为第二汉武，定于一尊，则余不忍泯此良心也。”（凡人：《无圣篇》，《河南》第3期）因此，提出“无圣”的主张。否定孔子“至圣先师”的地位，打破了偶像崇拜，解放了思想。一般来说，他们对孔子在学术教育上的贡献都是肯定的，甚至认为周秦诸子之中“未有出孔子之右者”。但是，他们也批评孔子学说、思想中的弊端，有的指出孔子思想有泥古守旧、排斥异己、不重实学；有的认为“孔子之教，唯在趋时”，“湛心利禄”（《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290—291页）。更为激烈的则说，中国“历数千年无进取，孔氏之罪也”（帝召：《孔子秋祭之感想》，《民呼报》1906年10月10日）；“孔丘砌专制政府之基，以荼毒吾同胞者，二千余年矣。……欲支那人之进于幸福，必先以孔丘之革命”（绝圣：《排孔征言》，《新世纪》，第52号）。此外，在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报刊中，有的文章从历史发展的眼光来评价孔子，认为孔子所处的时代为“封建之时代”，“其语言之不适用于今世界者，更仆难终”（《道统辨》，《国民日报汇编》第3页）；孔子“乃代表其一时，非代表于永世。今日有大于孔子者，则代表将移于今；后日有大于今日代表者，则代表复移于后”（凡人：《无圣篇》，《河南》第3期）。对于孔子和儒学的这些言论，其激烈程度不亚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陈独秀、李大钊、易白沙等人对孔子的评论，都不是完全否定的，而是既有批判又有肯定。他们反对孔教，批判三纲五常，“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认为孔子之道“不合于现代社会之生活”。但是，他们也肯定了孔子和孔学的历史地位和价值，如陈独秀就明确表示，“反对孔教，并不是反对孔子个人，也不是说他在古代社会无价值”（《孔教研究》，《每周评论》第20号）；李大钊也认为，“孔子于其生存时代之社会，确足为其社会之中枢，确足为其时代之圣哲，其说亦确足以代表其社会及时代之道德”（《李大钊选集》第79页）。从上所述不难看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传统，在对待孔子和儒学上，所持的态度和所涉及的问题，和辛亥革命时期基本上是一样的，可以说是一脉相传。

对待诸子学、孔子和儒学的问题，也就是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在辛亥革命时期，在资产阶级革命派中出现了一个派别叫“国粹派”。国粹派以“保种、爱国、存学”为宗旨，鼓吹保存国粹，提倡发扬国学。这种国粹思潮的兴起，其中主要一点是针对当时社会上存在的“醉心欧化”的思想倾向。鸦片战争后，在对待西方文化问题上曾不断发生争议。随后，对于中国固有文化也有了不同的认识和评价。大约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上也就出现了“醉心欧化”而对自己民族文化盲目否定的虚无主义观点。有人对西方盲目崇拜，“尊

西士为圣神，崇欧人为贵种”（《论中国对外思想之变迁》，《警钟日报》1904年6月2日），鼓吹“彻底输入文明”。正如章太炎所说：“近来有一种欧化主义的人，总说中国人比西洋人所差甚远，所以自甘暴弃，说中国必定灭亡，黄种必定剿绝。因为他不晓得中国的长处，见得别无可爱，就把爱国爱种的心，一日衰薄一日”（《演说录》，《民报》第6号）。国粹派针对“醉心欧化”者的民族文化虚无主义思想，主张发扬国粹，用国粹来“激动种姓，增进爱国的热肠”，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求得排满革命的助力。然而欧化主义者则认为，中国的国粹“已属过去之陈迹”，“尤当早于今日陈诸博物馆”（反：《国粹之处分》，《新世纪》第44号）。在对待中西文化问题的争论上，不论国粹派或欧化主义者，都存在着片面性。国粹派强调发扬国粹，不免偏重旧学而轻薄西学，有些人甚至把封建纲常名教当做“吾族之灵魂”加以颂扬，更是错误。国粹派注意了文化的传承性和民族性，但忽视了文化的时代性，忽视了文化的近代化，不能不表现出文化的保守倾向。欧化主义者注意了文化的时代性，注意文化“无分于东西”，要吸收西方的新文明，但认为“万事当以进化为衡”，忽视东西文化各有创造，各具特点，从而抹煞了文化的传承性和民族性，陷于民族文化虚无主义。“五四”新文化运动及其后的长期对于中西文化问题的争论，所谓“东方文化派”、“中国本位文化”派和“全盘西化”派，其实质都是辛亥革命时期这两种文化思潮的延伸。即如把东方文化归之于“精神”的，西方文化为“形质”的；东方文化是“静”的，西方文化是“动”的等说法，在当时也都提出来了。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大贡献是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此后白话文在社会上被普遍应用。但是，白话文运动并非始于“五四”时期，也不是象胡适自己夸耀的那样是他的新发明和首倡，在辛亥革命时期已经存在着白话文运动。清末完全用白话文的报刊，在戊戌维新时期已被注意，从1897年至1900年间大约办了六七种。到了20世纪初，白话文报刊大量增加。从1901年到1911年，白话文报刊不下一百二三十种。其中多的年份，一年就创办20多种。几乎遍及全国各省，都创办白话报刊，甚至边疆地区如西藏、新疆、蒙古等地都办有白话报（《西藏白话报》、《伊犁白话报》、《蒙古白话报》），可以说很是兴盛。这些白话报刊中，相当一部分是宣传革命思想的，也可以说是为了革命的需要而创办的。白话文比文言文更易于普及和宣传群众，更能服务于革命。与此相关，白话报刊的创办还为了“开通民智”，认为“白话报者，文明普及之本也。白话推行既广，则中国文明之进行可推矣”（《论白话与中国前途之关系》，《警钟日报》1904年4月25日）。显然，正是辛亥革命推动了白话文运动出现第一个高潮；而白话文运动也为革命做出了贡献，发挥了它的作用。进入民国，白话报刊仍然存在。除去白话报刊外，清末的白话小说和白话教科书等的传播也不容忽视。这就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打下了广泛的基础。如果没有这样的基础，“五四”时期只是由于一个或几个人、一份刊物一提倡就立即能普遍推行，是难以达到的。

还需要提到新文化的宣传者、倡导者。辛亥革命时期从事革命活动的一些重要人物，同时也都做文字工作，热心宣传新文化，批判旧文化。有的人革命活动虽不明显，但撰文批判儒学则很突出。这些人物中，主要如陈独秀、蔡元培、鲁迅、吴虞、马君武、李大钊等。正是陈独秀、蔡元培等人，后来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参加者。很明显，辛亥时期的文化革新者，也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推行者，是同一批人，也是同一代人。或许可以这样说，不论从人的因素来看，或从所提的问题来看，“五四”新文化运动是辛亥文化革新的延伸和发展。辛亥革命时期的文化革新为“五四”前新文化运动奠定了基础。